

桐城派 与 清代学术流变

曾光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桐城派 与清代学术流变

曾光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曾光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161 - 8789 - 0

I. ①桐… II. ①曾… III. ①桐城派—文学思想史—研究—
中国—清代 IV. ①I207.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686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芳
责任编辑 刘 芳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05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笔者虽然不是安徽桐城人，但从事桐城派研究已近二十年。在这一漫长的研究过程中，不管是对桐城派还是对桐城这座城市都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研究工作的需要，笔者曾多次到桐城考察交流。每次到桐城，都发现桐城派与桐城的联系是如此紧密。虽说桐城派消亡已近百年，但桐城派在桐城几乎是妇孺皆知，这与那些曲高和寡的传统学派在当代中国的境遇显然有所不同。经过一个多世纪时光的洗刷，每一个到过桐城的学人仍能强烈地感受到桐城派曾有的学术生命与影响力，这也是促使我对桐城派展开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桐城派因桐城而得名，而桐城也因桐城派而彰显于世。其实，自前清以来，桐城派之于桐城这座城市就具有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在清代传承近两百余年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及学术派别以这座城市命名，使这座地处安徽南部的城市成为知名度极高的历史文化名城。桐城派由桐城人开创，并以桐城冠名，使它具有了强烈的区域色彩。这种区域色彩使桐城派对桐城人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故桐城人在桐城派中占据相当比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桐城这一特定区域而形成的同乡关系在桐城派创建初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如果桐城派一直囿于区域的限制，那么它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掀起波澜，但一代代桐城派学人通过在全国各地书院的讲学活动及其他学术传承方式，使桐城派在人员构成与影响上不断突破区域的限制，最终发展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及学术派别。当然，桐城派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学派还有别的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这个以城市命名的学派的学术主张不仅是对唐代以来古文运动的发展，还顺应了清代学术、文学的发展大势；顺应了当时的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这就使桐城派从创建之初就超越了地域的限制。换句话说，桐城派的学术主张不仅仅是以方苞、刘大櫆、姚鼐、吴汝纶等为代表的清代桐城学

人的主张，更是以桐城的名义展现了超越桐城乃至超越时代限制的学术主张，这种“超越”也许正是桐城派的生命力与魅力所在。当今中国的不少城市都在打造属于自己的学派，对于这些城市而言，桐城派的发展史应该有不少借鉴意义。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桐城人姚鼐的这句名言既道出了一个桐城人的自豪，也道出了桐城派所以立派扬名的重要原因，即桐城派文章不仅是属于桐城的，也是属于“天下”的。这种“天下”的视野正是桐城派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学派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是否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有地方文化特色，又能突破地域局限的地方学派才有可能在全国性的范围产生重大的文化及学术影响，这种全国性的影响不仅不会阻碍地方学派的发展，反而会促进地方学派的发展，同时还扩展了地方的文化美名。纵观近代以来有关桐城派的研究，也是一脉相承地体现了桐城派超越地域性限制的文化特色，来自不同地域的海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桐城派所展开的研究使桐城派研究得以不断深化拓展。

笔者近年来就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对桐城派展开研究，先期发表的一些有关桐城派研究的文章或专著就分别从文学、教育、社会思潮、文化等角度展开，本书则是尝试从学术视角展开研究。虽说学界已有不少从学术角度对桐城派展开研究的成果，但笔者力求将桐城派置于清代学术流变的大背景中进行系统研究。归结起来，本书力求展现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桐城派以桐城冠名，具有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区域性色彩的学派，又与清一代理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从总体来看，桐城派是一个超越了区域限制，在清代学术领域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学派。二是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清朝的官方学术即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三是桐城派作为清代宋学一派的中坚，虽然与汉学派攻讦不休，但纵观桐城派的发展，其严分汉宋的学术主张最终还是转向了学术上的兼收并蓄。这既是近代中国时代发展的大势使然，也是桐城派历代学人学术胸怀的生动体现。当一个学派在学术上呈现出开放的态势时，这正是其学术自信的体现；反之，当一个学派固守学派壁垒时，恰是体现出其学术上的不自信。桐城派最后走向消亡，虽与近代学术与社会发展大势相关，也与其自身在最需要开放兼收的时刻转向固守门户有关。四是作为清政府官方学术维护者的身份既决定了桐城派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在学术上不可能有

太多创新，桐城派及其学术思想随清政府兴而兴，亦随清政府亡而亡的命运也自在情理之中了。世上既没有永存的学术派别，也没有能永远开新的学术派别。与任何一个传统学派一样，桐城派有兴盛之时，也有衰亡之时。评价一个学派时，不能仅取其衰亡阶段的表现而对其做出整体上的否定判断。

桐城派能在有清一朝延续二百余年，发展高峰时，追随者“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天下翕然，号为正宗”，其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声势之盛，已经充分展示了桐城派在兴盛时期的文化与学术生命力。桐城派是一座矿藏丰富的学术宝库，不管是对桐城派发展流变的研究，还是对桐城派内在生命力的探寻，诸多方面都还值得继续深入挖掘。从扩展开来的意义上看，对一个传统学派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学术生命力的探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乃至是对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探寻。

目 录

绪言	(1)
一 关于研究时段的说明	(2)
二 桐城派研究现状述评	(3)
(一)从学术角度对桐城派展开研究的情况	(3)
(二)关于桐城派是学派还是文派的论争	(5)
三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8)
 第一章 清初学术流变与桐城派学术正统地位的确立	(11)
一 清初桐城派兴起的官方学术“土壤”	(11)
(一)清初的文化政策与清朝官方学术的确立	(13)
(二)制度设计与学术走向：清代科举制度、教育制度与桐城派学术正统地位的强化	(15)
二 清初的学术高压与桐城派的机会	(20)
(一)清初的学术政治氛围：文化高压与学术导向	(21)
(二)方苞的人生转机与桐城派正统学术地位的建立	(24)
(三)适者生存：方苞的“变”与“不变”	(29)
三 从方苞到姚鼐：桐城派古文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学术选择	(33)
(一)“桐城三祖”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体系的构建	(33)
(二)桐城派三祖的学术选择：学行继程、朱之后	(49)
(三)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的传承	(52)
 第二章 桐城派与汉学家之间的恩怨纷争及兼收调和	(56)
一 桐城派创始人与汉学家的恩怨问题	(56)
(一)关于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交恶	(57)
(二)桐城派与汉学派之间的学术沟壑	(62)

二 姚门弟子与汉学家的学术纷争：以《汉学商兑》学术批判方式为例	(67)
(一) 方东树与江藩的学术对立	(68)
(二) 《汉学商兑》学术批判方式探析	(70)
三 关于桐城派“汉宋兼收”的学术思想	(85)
(一) 姚鼐的“义理、文章、考证”三事说	(86)
(二) 嘉道年间姚门弟子的学术兼收思想	(90)
(三) 曾国藩的学术兼收思想	(91)
(四) 近代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与汉宋之争的消融	(93)

第三章 桐城派与晚清理学经世思潮

一 晚清的社会变局与理学经世思潮的勃兴：桐城派的低谷与转机	(96)
(一) 桐城派的发展低谷	(96)
(二) 帝王的好恶与学术的命运	(97)
(三) 晚清理学复兴与桐城派的新机	(102)
二 道德重建：晚清桐城派经世的一种尝试	(107)
(一) 桐城派始祖对程朱理学的尊崇及对程朱道德的强调	(108)
(二) 姚门弟子对程朱道德的强调与学术主导地位的争夺	(111)
三 以古文之笔撰史地著述：桐城派文士实现经世之志的又一方式	(115)
(一) 姚门弟子的历史变易观及对经世之文的理解	(116)
(二) 姚莹写就的经世巨著：《康輶纪行》	(118)
(三) 桐城—湘乡派有关西学介绍的史地著述	(123)
四 曾国藩“中兴桐城”及其理学经世思想的特征	(133)
(一) 曾国藩“中兴桐城”对于桐城派发展的重要意义	(134)
(二)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三大特征	(136)

第四章 甲午战后理学的衰落与清末桐城派的学术

困境及学术传承	(146)
一 甲午战后理学的衰落及桐城派面临的挑战	(147)
(一) 甲午战败后理学的衰落	(147)

(二) 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与桐城派面临的学术困境	(148)
(三) 清末教育制度的近代转型与桐城派面临的危机	(151)
二 桐城派末代领袖吴汝纶与清末桐城派的学术传承	(155)
(一) 传统学术大师的学术魅力在学派传承中的独特作用 ...	(156)
(二) 传统教育方式在清末桐城派学术传承中的巨大作用 ...	(165)
结语 桐城派末流余音	(172)
参考文献	(180)
后记	(188)

绪 言

桐城派作为清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与清代学术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它与清代理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上。^① 桐城派坚守程朱义理，是清代理学一派的中坚力量，故桐城派的发展轨迹与清代理学有很大的相似性。综观晚清一段，当理学处于发展低谷时，桐城派也相应处于发展低谷；当理学走向复兴时，也是桐城派“中兴”之时；当理学在西学冲击下走向衰亡时，桐城派古文也面临着被时代淘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思潮高涨，革命民主主义思潮悄然涌动，程朱义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西学在甲午战争后的大规模传入，加快了学术由传统经学向现代转型的步伐，理学与晚清桐城派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与学术转型的进程中最终为历史所抛弃。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之间的联系还体现在它与清代汉学之间既相争又兼容的复杂关系上。有清一代，汉、宋两派围绕考据、义理攻讦不休，桐城派作为清代宋学一派的主要代表自然会被卷入汉、宋之争中。乾嘉之际，汉学大兴，桐城派学人方东树就因著《汉学商兑》与宋学派相论争而名噪一时。鸦片战争前后，社会的危机，社会道德的普遍沦落，士林风气的败坏，使汉学成为经世派学者抨击的中心。当汉学一派在社会危机前一筹莫展之时，晚清桐城派不仅在经世致用与道德重建上赋予了理学新的时代特色，还大力倡导学术兼收，使理学也使自身获得了新的活力。

^① 本书所言的理学主要指其主流学派程朱理学。在清代，理学与宋学基本同义，理学派基本就等同于宋学派。桐城派学人王先谦曾说：“所谓宋学者，义理是也。”（王先谦：《复阎季蓉书》，载王先谦撰、梅季校点《王先谦诗文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02页）近世学人邓实在《国学今论》中也曾说：“方、姚之徒，治古文辞，自谓因文而道，尸程、朱之传，是曰宋学。”（邓实：《国学今论》，载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从邓实所论，也是将“程、朱之传”视同为“宋学”。

桐城派作为清代影响最大的、具有浓厚学术色彩的文派，在有清一代居于学术正统的地位，清朝灭亡后又被斥为“谬种”“妖孽”。这种学术及政治地位上的大起大落都使桐城派具有了学术研究上的典型意义，对桐城派学术思想流变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流变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中国传统学术发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有助于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体制内知识分子政治情怀与学术精神的认识。

一 关于研究时段的说明

本书以《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为题，显然是将研究时限主要限定在“清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当然，在具体写作中，部分内容也会涉及民国初年的桐城派末流，以保证对桐城派研究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桐城派起于清康熙年间，自此延绵兴盛长达二百余年。其实，即便是在清王朝灭亡以后，桐城派末流在民国初年还颇有影响。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郎舅三人就是在民初学界颇有影响的桐城派正宗传人，与桐城派关系密切的严复、林纾在民国初年的学界更是风云人物。^① 笔者之所以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清朝时期的桐城派，一是因为这一时段是桐城派发展的主要时期，目前学界对桐城派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段；二是因为本书的研究重点在挖掘桐城派的兴衰与清王朝及其官方学术之间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古语可谓对桐城派与清王朝之间关系的形象说明。作为清王朝“御用学派”的桐城派兴起于统治的需要，衰于清王朝统治的终结，其命运与作为清代官方学术的程朱理学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一个学派的发展历程与一个朝廷及其官方学术的兴亡轨迹几乎叠合，其间所展现的正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学术与政治之间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联。

^① 严复、林纾与桐城派的关系颇为密切，关于他们与桐城派的关系，学界已多有梳理。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就已提出：“严复、林纾是桐城的嫡派。”（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关于严复与桐城派的关系，可参看潘务正《严复与桐城派——以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不收严复为中心的考察》，《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等文；关于林纾与桐城派的关系，可参看王济民《林纾与桐城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等文。笔者在后文涉及相关问题时也会有所阐述。

二 桐城派研究现状述评

桐城派自清初产生以后就毁誉参半，其末流在新文化运动中更是被斥为桐城“谬种”。桐城派所以被打上这样的文化烙印，客观来看，更多是缘于政治上的因素，学术因素倒在其次。近代中国政治思潮瞬息万变，当新文化思潮逐渐退潮后，对桐城派的重新审视与评价也就随之展开。早在1922年，作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就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提出要实事求是地研究桐城派。

综观“五四”以来近百年的桐城派研究，学者们大都是从文学维度展开研究，对桐城派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地位，论者大多予以或多或少的肯定，对桐城派的政治倾向与社会作用，则大多予以否定。^①由于本书重在研究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之间的关系，故笔者于此主要就与本书研究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展开学术史的述评。

（一）从学术角度对桐城派展开研究的情况

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从学术角度对桐城派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但他对桐城派的学术成就评价甚低：“（桐城派）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阙创获，无益于社会。”^②总体来看，从学术角度研究桐城派，学界已有的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认为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的传承、发展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梁启超早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将桐城派视为清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与传承者。^③龚书铎先生主编的《清代理学史》也认为：“在清代中叶汉学兴盛的大环境下，理学总体呈退潮之势，基本无理学派别活跃于学坛。这样的背景下，桐城派可谓异数。作为著名的文学流派，该派作家不仅于古文学义法方面多所创见，而且尊崇程、朱，以维护程朱理学为己任。”^④

① 参见王献永《“五四”以来桐城派研究讨论情况综述》，载王献永《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3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0页。

③ 同上书，第5页。

④ 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中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其二，学者们一般认为，由于桐城派与程朱理学具有密切关系，故其在学术上持门户之见，与汉学家相对立。^①关于桐城派与清代汉学派之间的对立、纷争，梁启超称之为“（桐城派）时与汉学为难”^②；有的学者则称之为“对垒”：“桐城派不仅是个文学流派，在清代学术史上，也是与汉学对垒的宋学一派的主要阵地。”^③

其三，桐城派在清代的兴盛与其汉宋兼收的学术态度有关。关于这一点，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桐城派“推崇程、朱，而又不废考据，无论如何，较诸明代及清初之为古文者，总是切实一点，总是于古学有所窥到一点，故能言之有物”^④。学者普遍认为这种学术兼收的态度对于桐城派的发展与兴盛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其四，一些研究者将桐城派的学术倾向与政治判断联系起来，并据此对桐城派作出否定的或相对肯定的评价。由于桐城派与清政府的官方学术联系紧密，故学者们从政治视角研究桐城派时多将否定的态度，如王献永就认为：“一般的评论者，总是把桐城派对待程朱理学和汉学的态度作为衡量其思想政治倾向的重要的事实与理论依据。”^⑤但也有学者认为在桐城派发展的一些阶段尚有可标可点之处，如刘再华一方面认为桐城派为一个旧的文学派别，一方面又认为“后期桐城派整体上可以定位为一个主张维新的旧文学派别”，并认为桐城派的“护旧思想固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但也包含着合理的内核”^⑥。还有学者提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桐城派称为‘程朱理学的卫道派’或清朝统治者的‘帮闲’，应该看到他们作为学者、文人相对独立的一面。”^⑦

其五，认为桐城派在学术上思想上亦有适应历史发展的一面。周中明认为：“桐城派在思想内容上有极大的包容性和适应性”^⑧；马积高也认

① 参见拙文《〈汉学商兑〉学米批判方式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页。

③ 武道房：《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

④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⑤ 王献永：《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7页。

⑥ 刘再华：《一个主张维新的旧文学派别——后期桐城派作家的经学立场与文化话语》，《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⑦ 刘相雨：《论桐城派与清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⑧ 周中明：《桐城派在清代长期兴盛的原因》，《文史知识》1997年第11期。

为：“不能说桐城派在学术上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保守的，它也有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一面，只是这一面比较弱小。”^① 其实，从适应历史发展的角度去分析桐城派的学术思想，更多地还是倾向于一种价值评判。

其六，试图从清代学术与文学的关系中去寻找桐城派演变的轨迹。马积高在《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一书中就专辟《清代理学与桐城派》一章，试图从学术史的角度去厘清作为文学派别的桐城派的发展源流。^② 但作者在研究时仅涉及桐城派与理学的关系，论述重点也放在桐城派前期。此处需提及的是，正是由于作为文学派别的桐城派与程朱理学之间所具有的密切关系，学者们在对桐城派展开整体的综合研究时，都不可能单纯地从文学或学术展开。综观近世以来有关桐城派研究的成果，文学与学术均是学者们在展开相关研究时绕不开的话题。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桐城派文人及桐城派古文其实与清代学术之间并无多少联系，如有学者就视桐城派学人为“纯文学作家”：“桐城派（尤其是刘大櫆、姚鼐）的宗旨是视古文为纯文学，所以他们讲求‘情辞’、音节、神韵、风格，即不仅与学术著作（指理学派、考据派的作品）划清界限，而且与杂文学（如史学派的作品）划清界限。姚鼐钟情于‘文人’风范，实即以纯文学作家自期和自许。”^③

（二）关于桐城派是学派还是文派的论争

自近代以来，学术界对桐城派是文派还是学派就一直存有争论。由于对桐城派是学派还是文派的定性这一问题与本课题的研究密切相关，为说明这一问题，现将学术界的相关观点介绍如下。

一种观点是以桐城派为一主要学派，其中以胡适的学生魏继昌的观点最为典型。魏继昌在《桐城古文学派小史》一书中提出：桐城派“是一个学派，而不是单纯的文派。因为桐城的作者，不只讲求文章还要顾及学行，与以诗歌创作为主的‘江西诗派’，以经学考证为主的‘汉学家’，以性理实践为主的‘道学家’，俱不相同。他们是从‘言有物、言有序’，发展到义理（思想）词章（艺术）考据（科学方法）三者并重的古文之学”^④。王献永在《桐

①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76—97页。

③ 陈文新：《论乾嘉年间的文章正宗之争》，《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④ 魏继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城文派》中虽然认为桐城派为一文学派别,但同时认为桐城派“带有一定的学派特点”^①。这部分学者所以认为桐城派主要为一学派或带有学派的特点,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桐城派与宋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于桐城派文章中处处可见的程朱义理;在于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之间的密切关联。^②

与上述观点形成对照的是,更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桐城派为一文学派别。近世学者刘师培在论及方苞及桐城派时就曾说过:“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内人士亦震其名,至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③显然视桐城派为文派。桐城派后裔吴孟复先生也认为桐城派为一文派,他将自己研究桐城派的著作定名为《桐城文派述论》也就表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倾向与判断。^④对桐城派研究颇有见地的马积高先生也认为:“桐城派是一个历时甚久、人数众多的文学流派。”^⑤如果往前追溯,较早对桐城派展开系统研究的是近代学人刘声木,他对桐城派的看法很有参考意义。^⑥刘声木致力于从目录学角度研究桐城派,曾著有《桐城

① 王献永:《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7页。

② 李帆在论及姚鼐时曾提出:“姚鼐的学术思想与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的基石,而且是对桐城派思想、学术观念的集中反映。”(李帆:《姚鼐学术思想述论》,《福建论坛》2006年第1期)此段文字所论就涉及桐城派文章与清代学术流变的密切关联。此段文字不仅将姚鼐的学术思想与文章理论并提,还将其学术思想视为文章理论的基石,显然作者是倾向于从学术角度去考量姚鼐及桐城派。

③ 刘师培:《左庵外集·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载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下),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8页。

④ 吴孟复先生所著《桐城文派述论》一书于2001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⑤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⑥ 刘声木(1878—1959),原名体信、字述之,后改名声木,字十枝,安徽庐江人。其父刘秉璋曾从李鸿章入淮军,官至四川总督。与桐城派颇有渊源的刘声木一生致力于从目录学角度研究桐城派,1924年,他著成《桐城文学源流考》《桐城文学撰述考》两书。1989年,黄山书社将此两书合为《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出版(徐天祥点校)。其中《桐城文学渊源考》收录归有光以下作家1223人;《桐城文学撰述考》列作者238人,收书目2370余种。该书“考其师承,录其名氏,括其生平,详其著作,提示传记评论之所在,兼具‘学案’‘目录’‘索引’之作用”,“实为研究桐城文派最佳之工具书”(吴孟复:《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序》,黄山书社1989年版)。马积高对此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刘声木所著《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的收录太滥,把凡与桐城派主要作者有某种直接、间接师友关系的学人都收进来了。他还提出,即使有直接的师友关系,学术趋向和文学趋向也不一定相同或相近,如孔广森,确是姚鼐门人,却是考据家和骈文作家,与桐城文派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本此类推,计当删去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但即使如此,桐城派学人也还可有五六百人(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文学源流考》《桐城文学撰述考》两部关于桐城派的目录学专著，由刘声木这两部书的书名也可看出他对桐城派的定性。在《桐城文学撰述考》一书的序言中，刘声木曾如此评价桐城派：“桐城文学流传至广，支流余裔蔓延天下，实为我朝二百余年文学一大掌故，关系匪细，非一人一家所得毁誉。”^①由此段文字，可以看出刘声木显然视桐城派为一文学派别。^②

值得注意的是，与桐城派同时代的学人也多视桐城派为文派，^③如与曾国藩同时代的梓湖文派创始人吴敏树在《与蔣岑论文派书》中就称：“今之所称桐城派者，始自乾隆年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己也。”^④由清人吴敏树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的学人多将桐城派归入文学派别之列，这对于后人认识桐城派的性质颇有帮助。

其实，桐城派究竟是学派还是文派，最有说服力的还是桐城派学人自己的说法。桐城派始祖之一的姚鼐曾作诗称：“顾思文载道，筌蹄徒寄耳。陋哉执此爱，束缚作文士。”^⑤直称自己为“文士”。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姚鼐还说：“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

①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序》，载刘声木著、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3页。

② 当然，刘声木也注意到桐城派与清代学术之间的特殊关系，他在论方苞之文时曾说：方苞“廓清之功，用力甚艰，虽未免理障，其词气取材荀卿，较宋五子为健劲。说经尤精卓，书序道峭似半山，碑版过求峻整，多用纪言体。运掉凌空，实能以宋儒之理衍八家之文，精者可以羽翼经传”。（刘声木著、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03—104页）刘声木此处虽主要从文学的角度评点方苞，但从“以宋儒之理衍八家之文，精者可以羽翼经传”一语又可看出他对方苞之文与清代宋学之间密切关系的强调。从这个角度看，桐城派确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派。

③ 关于这一点，胡蕴玉有系统的陈述：“方苞姚鼐之徒，尸程朱之传，仿欧曾之法，治古文辞，号曰宋学。明于呼应顿挫，谄于转折波澜，自谓因文见道，别树一帜。海内人士，翕然宗之，至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胡蕴玉：《中国文学史序》，载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43页）

④ 吴敏树（1805—1873），湖南巴陵（今岳阳）人，字本深，又称南屏先生。吴敏树当时虽以古文名世，却不愿与桐城派并称。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曾将吴敏树归为姚鼐弟子：“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但吴敏树并不以为然，他在《与蔣岑论文派书》一文中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不屑于与桐城派同派为伍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中并未将吴敏树列为姚鼐的弟子。

⑤ 姚鼐：《夜读》，载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9页。“筌”为捕鱼竹器，“蹄”是猎兔器具。“筌蹄”连用喻指达到目的的手段。

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篇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①姚鼐在这里显然视桐城派学人为“古文家”“文章家”。姚鼐所著《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是桐城派立派的标志性文章，从姚鼐在此文中对“文”的强调，对“天下文章”皆出桐城的自信来看，桐城派当是文派无疑。

桐城派末代文士马其昶在《〈濂亭集〉序》中论及桐城派历史时也是从文学的维度追溯桐城派源流：“由二先生之言（指张裕钊、吴汝纶——笔者注），以上溯文正及姚、方、归氏，又上而至宋、唐大家，而至两汉，犹循庭阶入宗庙而禘昭穆也。”^②显然视桐城派为古文一脉在清代的正宗传承。从桐城派的主要成就来看，桐城派也当是文派无疑。桐城派主要以古文名世，方苞所著《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游雁荡记》，姚鼐所著《登泰山记》，吴汝纶所著《〈天演论〉序》等文均是清代古文中的传世名篇。

笔者在写作中也认为桐城派为一文学派别，但又强调其为一与清代学术流变有着密切关联的文学派别。“理”与“法”是桐城派古文的两大支撑，不管是对“理”的重视还是对“法”的过于强调都使桐城派与真正的文学派别有着一定的距离。^③这种距离虽然弱化了桐城派作为文学派别的色彩，但是在相当程度上使桐城派与“理”、与清代学术流变有了诸多干系，这也是本课题得以成立并展开的重要因素。

三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为使研究线索显得更加清晰，现将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稍作说明。

桐城派作为一个与清王朝相始终的散文派别，以倡导“义法”说而

①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载姚鼐著、刘季高点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② 马其昶：《〈濂亭集〉序》，《抱润轩文集》卷3，宣统元年安徽官纸印刷局石印本。

③ 吴敏树在《与筱岑论文派书》中对方苞文章有如此评价：“归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虚，声几欲下。望溪之文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梓湖文集》卷5，同治八年（1869）刻本）由吴敏树所论，可见方苞之文更重“理”“法”，并不工于文章之“言”。